



从“真教育”到“新教育”:五四时期 陈独秀教育理念探微

崔佳媛,李 璐

(陕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21)

摘 要:教育是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变革社会的重要环节。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教育理念经过了从“真教育”到“新教育”的演进,在此过程他对国内教育改革进行了取舍:在指导思想上,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推崇西方制度模式;在教育方针中,借鉴实用主义,提倡发挥教育之功效;在教育主体上,扩大对象范围,借鉴社会主义思想,向平民化教育转型。陈独秀的教育理念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也为促进国民性解放提供重要推力。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教育理念能够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实践提供重要借鉴。

关键词:五四时期;陈独秀;真教育;新教育;教育理念

中图分类号: G40-09;G5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3) 12-0664-06

From "true education" to "new education": On Chen Duxiu's educational ideas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CUI Jiayuan, LI Lu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Xi'an 710021,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link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character and society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Chen Duxiu'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underwent an evolution from "true education" to "new educ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he made choices about domestic education reform: in terms of the guiding ideology, he suggested people should held high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and science, and advocate the Western institutional model; with regard to the educational policy, pragmatism should be used for reference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ness of education; as for the subject of education, people should expand the scope of objects, draw on socialist ideas, and transform towards civilian education. Chen Duxiu'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s a product of a specific era and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but i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impetus for promoting national liberation. The study of Chen Duxiu's educational ideas during the May Fourth Period can provide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Chinese Communists.

Key words: the May Fourth Period; Chen Duxiu; true education; new education; education ideas

五四时期,在诸多先进知识分子的带领下,文化迎来了如火如荼的革新浪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五四运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以陈独秀为首的革命者们首先将目光投向青年人,对国内教育领域实施改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

收稿日期:2023-02-15 网络出版日期:2023-08-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9CZJ007)

作者简介:崔佳媛(1999—),女,陕西西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方面的研究。

通信作者:李 璐, E-mail: xinyeconglin@yeah.net

国的早期传播奠定基础。就陈独秀个人而言,其“新教育”是对西方科学思想的集合体,是经过辩证思考诞生的新标签,但由于时代局限和其不成熟的思想基础,难以实现“新教育”广泛的、具体的推进。因此,新时代的教育改革需要在借鉴外来优秀文化的同时发展自身特色,形成更加科学、完善的教育体系,在实践中推进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关于陈独秀教育理念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受到学界持续关注。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一是探究陈独秀新教育理念的内涵及传授方法^[2];二是将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教育理念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探究其不同阶段的思想表现^[3];三是探究陈独秀教育改革实践并得出启示^[4];四是将陈独秀教育理念与同时期知识分子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历史贡献,阐述其时代意义^[5]。总之,学界重点研究了陈独秀教育观的内涵、特征、实践形式、意义启示等方面,但尚无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用动态的眼光分析陈独秀教育思想转型过程中对教育的认知程度及其时代性选择。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陈独秀“真教育”、“新教育”的内涵,旨在探究五四时期陈独秀对中西制度、文化、思想的认识变化及转型表现,侧重于探究在此演变中陈独秀对教育的取舍,分析“新教育”的功能性、现实性与历史性,对中国教育现代化转型展开深入研究。

一、“真教育”:以西方文化改造国民性

面对西方列强的重创以及内部自省求变的惨痛教训,陈独秀意识到当前最迫切、最先解决的应该是思想上的觉悟,即对伦理问题的改革,尤其是对顽固守旧之孔教的拔除。陈独秀指出,要想“平等人权之新信仰”^[6],就要有反抗孔教之道的觉悟。他将孔教视为“旧”,欧化命为“新”,而这“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7]104},如若调和,只会自相矛盾,成为“里旧表新”的“伪”欺人者^{[7]104}。他有意区分东西方文化,欲借西方文化开启国内现代化的大门。由此,在教育层面,陈独秀提出“真”与“伪”的概念为国民教育改造服务。

陈独秀指出,“伪教育”在思想上是“盲目的国粹主义”,在制度上不过是“科举之变相”罢了^{[7]127};而与之相对的西洋之“真教育”,则是“自动的”“启发的”“实用的”“社会的”“直视的”“世俗的”“全身的”“推理的”和“科学的”^{[7]127}。在《近代西洋教育》中,陈独秀更加详细地阐述了“真教育”的教育方针。他指出“真教育”之所以是启发的、灌输的,是因为教师

的职责应是引导儿童思考,要启发孩童的灵性,养成其“自动能力”^{[8]219};“真教育”之所以是世俗的、直观的,是因为西洋教育的蓬勃发展无一不含“科学实证的精神”,西方所重视的是“世俗日用的知识”,研究的是“直观自然界的现象”,由此中国教育更要“弃神而重人”,抛弃虚无缥缈的幻想^{[8]220};“真教育”之所以是全身的,是指“不单独注重脑部”的训练,还要“体操发展全身的力量”,才能显示中国人的傲骨和精气神^{[8]220-221}。简言之,“真教育”指的是以西方文化为蓝本,塑造人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启发学生思考、锻炼学生体魄的科学教育方式。面对现代化的转型,陈独秀认为中国当前只有贯彻“真教育”才能整顿社会的陈腐风气,要从全面培养新时代的青年人抓起。

(一)塑造独立自主人格

陈独秀认为,“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6]是治理社会的根本问题,其中人格独立和经济独立共同带动社会风纪与物质文明^{[9]153}。只有在伦理学上取得个人人格独立,在经济学上取得个人财产独立,才会推进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孔教以“家庭”名义限制了二者发展。他指出:“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9]153}具体来讲,人先有了独立意识才能深入发展。陈独秀认为一种学说会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而孔教独尊地位难以撼动,那么这种不变之物必定无法适用于现代社会。正是因为孔教在人意识中扎根,才会导致国民缺乏自主人格意识。在财产所有权上,“财产之个人独立更不相涉”^{[9]153}。中国历来以家族为本位,以“重家族,轻个人”^{[10]99}为情感基础,那么父子、夫妻之间就会出现强者为尊、一方服从另一方的现象,在经济财产上就更加难以割舍。而发挥独立自主的意识,各行其是、不相互依赖,才是独立、平等的具体表现。

尽管陈独秀曾强调他本身排斥的孔教是指三纲五常之类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旧道德规范,并非孔子本人及其全部言论,但是在儒家“仁”和“礼”的理论体系中,陈独秀始终对“仁”的精神价值避而不谈,未曾从儒学全面的角度去分析孔子之道的社会价值。他指出儒家的三纲之说是“滋生阶级制度及专制思想的根源,也是形成与西方判然有别的政治制度的根本”^[11]。因此,陈独秀认为彻底摆脱孔教,是追求自由独立的第一步。

(二)全面发展素质教育

陈独秀向来重视青年人的心理状态、身体素质和道德素质。他从德、智、体三方面入手,旨在唤醒

青年人的自主意识。在陈独秀看来,青年应该酷似朝阳烈火,宛如朝雨晨露。唯有青年人挺身而出并有所作为,才能洗涤和治愈当前社会的腐败,若想脱胎换骨,就要改变认知、整顿思想,“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以此斩除腐败之邪气^{[12]74}。反观西洋民族,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10]98},无论是制度、法律还是伦理、思想都是为追求人权的平等和个性的发展。而千百年来的中华民族受到宗法礼教的束缚,人们难以意识到自身的欲望和诉求,长此以往,只会让宗法制度带来的恶果愈变愈烈。

同样,陈独秀指出青年人应具备强健的体魄,拥有顽强的抵抗力是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国内像欧美青年那样“面红体壮”“威武陵人者”好似“凤毛麟角”,大多数“力不能堪”“壮无能为”,那些不识卫生又无科学常识的国人多伴以疾病死去^{[13]112}。再者,除了生理方面,精神方面的抵抗力也十分重要,这关乎国运兴衰。青年在成长中会受到各式各样的诱惑,“亦将随波逐流”,假若“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只会让国家衰亡,致使民众丧失国民性^[14]。反观西洋孕育的文明则与蒙昧相对,他认为“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的近世文明“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15]。五四时期陈独秀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多以此为基础。

总之,“真教育”的改革主要针对青年人思想、心理、身体素质方面的启发与培养。陈独秀在对青年人的教育上推崇西方模式,拿西洋的既有优势与近代中国的弊病相比较,以证明本民族文化的“劣根性”。这种做法在现代学者看来是偏激而片面的,但在当时不乏是急于求变的“正当理由”。有学者指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前,“他们希望通过借鉴外国教育的经验改造中国的教育,并通过新教育开启民智,建设新国家。”^[16]因此,效仿西方成为一条捷径,这导致陈独秀的观念略显偏颇。

二、“新教育”:实用主义之功效与平民教育之趋势

陈独秀曾反思,列强国家之所以“隆盛”^{[12]73},是因为国家经营的合理性,尤其是国民教育的成功。于是,他重新阐述了“新教育”对社会改革的重要性。陈独秀在《新教育是什么?》中指出“新教育”是客观的,性质是社会的、方法是启发的^{[17]567};即“新教育”能够以科学的、社会的立场解决实际问题。他反观“旧教育”存在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病,即先生

一味灌输知识、不体察学生的“主观主义”,以及教育部糊弄教学、学生应付考试的“形式主义”^{[18]508-510}。二者差异表现在“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17]577}。

(一)“新教育”的性质是“社会的”

既然教育的目的是求改造、谋幸福,那么教育的方法和内容相应地联系社会实际。陈独秀将“新教育”理念的重心从对旧教育的强烈否定转移到如何改革的问题上去,并非像宣传“真教育”那样为培养个人的思想道德水平添加过多笔墨,较前期相比更加强调教育对社会的功效。在《新教育的精神》中,他反思教育“只要方法新,精神新,并不在科目的新”,哪怕是旧教育也有其存在的价值^[19]。具体来看,他认为“新教育”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尤其要详察当地的经济体制和财政状况,才能让教育对社会起到实际作用;教与学双方都应该明晰教育的作用及意义,要以生活改良与社会进步为目的,将教育的成效落到实处。

杜威初到中国的第一年,发表了诸多与五四思潮合拍的演讲,在国内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20]。杜威认为“拿教育来改造社会,虽说缓慢,实在是唯一方法”^{[21]269}。他提出改造社会最重要的是改变思想和习惯,使正确的知识、实用的技能、科学的方法相互配合,继而实现社会的改造。而教育当前存在两种重要趋势,即“普及”和“实用”。一方面,“受教育并非权利,乃是义务”^{[21]268},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教育是“用以适应社会需要的”,是以“谋生活”为目的的工具之一^{[21]268}。在杜威的理论体系中,教育和社会的关系具象化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其中体现的一种“共和国精神”,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且“各个人有机会能发展社会的幸福”^{[21]225}。同样,陈独秀也一直在强调国民自主意识的觉醒,呼吁青年人在消沉和绝望中,振作精神、追求真正意义上的幸福^{[13]114}。他认为,以树立正确的信仰和追求为前提,才能进一步将教育践行到社会中。可以看出,陈独秀很赞同杜威的观点,且十分推崇。总体来说,陈独秀提出的“新教育”已成为“真教育”的概念延伸,涵盖了从教育方针到教育方法的内在逻辑,既注重情感教育、素质教育、启迪教育,还强调了教育的社会功能。

(二)“新教育”的方法是“启发的”

陈独秀指出,当前国内教育存在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弊端,强调“新教育”在师生关系和与社会关系中的重要性。他要求重视对孩童的启发教学,认为国内教师传授知识无非就是照本宣科;不但内容始终如一,而且教学形式单一,学生难免会觉得枯

枯燥乏味。另外,学生会为了追求通过考试浅显地学习知识,即使成绩优异,但缺乏创造性思维和自主意识,进入社会也难以将知识转化为实操。他认为“旧教育”的缺点之一,就是“减少训练的效力”^{[17]571};出于“旧教育”的被动保守,假若教育脱离了“训练”,会导致学生不但学习僵化,而且进入社会后会变得随波逐流、自甘堕落。具体来讲,学生无从得到实操训练,诸如工业学校没有工厂、农业学校没有农场之类,这种教育模式既无法达到教育的目的,又会消磨学生的能力^{[18]509}。为此,他一再强调学生训练的重要性,不仅是思维上的启发,也提倡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相较而言,杜威同样强调教学活动应该唤起儿童的天性、培养其思维能力。二者都认为教师作为引导的一方,理应因材施教。杜威在《教育者的天职》中指出:“教师教授时,应当注意个性的培养。”^{[21]280}在他看来,儿童之所以要启发,是因为他们不具备成年人一般的知识储备,未知事物会激发内心的欲望,欲望的产生会激起对知识的渴求,继而获取新知。所以教育者有责任激发孩童的天性,让儿童脱离课本知识,在实践中丰富知识学习、提升道德情感。再者,当时社会提倡启发教育的学者并非陈独秀,著名教育家蔡元培曾言:“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22]可见,陈独秀能够积极汲取社会各界的进步言论,进一步丰富“新教育”理论,推进新式教育改革。

(三)“新教育”的趋势是“平民的”

陈独秀认为,若要确保国内教育发展,理应奠定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并取得相应成效才能走出艰难的发展窘境。他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提出:“盖教育之道无他,乃以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而去其短,长与短即适与不适也”^{[23]85},制定正确的教育方针,则需要适应世界发展之道,“以吾昏惰积弱之民,谋教育之方针,计惟去短择长,弃不适以求其适”^{[23]85}。他指出的“发展人间身心之所长”,便是如西方的科学精神一般,发扬其现实主义^{[23]86}、惟民主义^{[23]87}、职业主义^{[23]88}、兽性主义^{[23]88}的价值观。他所言“取长去短”中所“取”的,便是西方的新精神、新思想、新体制,他认为西方正是因为对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重视,才会拥有科学的教育方针;其中“去”的便是中国的旧思想、旧伦理、旧政治,而新体制、新教育的建立,不是孔教之道,是西洋推行的民主共和。

正是由于陈独秀进一步探究了西方政治与民主形态,他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开始吸收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政治的发展程度会影响教育的质量水平,“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24],如果国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国家经济制度完善了,其他问题的改革也迎刃而解。在《马尔赛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中,陈独秀试图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研究经济、人口问题,并指出该论断中资本主义的弊病;他认为民众普遍贫困的本质是由于私有制度下“分配不均”造成的^[25]。他通过谈论生产关系和人口问题,辩证地看待了东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在《告北京劳动界》中,陈独秀呼吁所有“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讲究自己的教育,清洁自己的卫生,维持自己的生计”^[26]。他指出,只有经济基础打牢了,才能发展上层建筑;只有满足民众利益,才可能让文化教育真正得到普及。他“希望教育界有由贵族的到平民的趋势”^{[27]657},认为在生产力不发达、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情况下推行平民教育十分困难,但是“在工业幼稚的资本制度之下能有少数的学校倾向平民主义,却也未尝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事”^{[27]657}。

在此基础上,陈独秀的目光从知识界转移到平民与劳动阶层,更加关注“教给谁”的问题。他呼吁广大工人阶级谋求自身应得的权利,指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28]。于是他提出工人也要接受教育,继而争取自身管理权的论断。一方面,陈独秀对工人做工现状展开调查,他认为工人受教育的主要障碍之一是资本家的压迫。工人的劳动量大、工作时间久、环境卫生差,然而“工人照例得不到分毫”^{[29]533},他们长期处于没钱养家糊口、延长工作时间、被榨取剩余价值的不利地位。若工人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无法享受,那么教育也将无从谈起。陈独秀认为,如果工人教育问题不解决,那么国民的知识、经历越退步,就越难以适应工业发展的实际,“将造成人种衰微的现象”^{[29]534}。另一方面,他教育工人应积极争取管理权,保障劳动的合法权益和医疗卫生等待遇。在《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中,陈独秀就不合理招工及待遇问题向工厂请愿,针对解决人格、劳力、工资问题切实保障工人的权益^{[29]465-466}。由此可见,工人教育问题既是工人自身缺乏阶级自觉的问题,是当时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是陈独秀将教育面向工人、面向大众改革的重要一步。

综上,陈独秀认为教育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若要切实发挥教育的功效,既要转变教学思路和方法,也要扩大受教育的主体范围。但是他推崇的“新教育”始终以效法西洋之体系为准,忽略了国内举步维

艰的教育现状。他将符合自身观念的理论拿来借鉴,用西方的教育成果替代或填补中国在现代化教育中的空缺。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对新、旧思想二者关系的认知程度。无论西方的生产力发展程度、教育水平有多先进,对照五四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来看,是否适用“新教育”则应该是一项必要探讨的问题。陈独秀对旧思想从根剔除的坚决态度,忽略了旧思想演化为具有本土特色的“新思想”的可能性。如果能够辩证地看待事物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吸收借鉴优秀的文明成果为己所用,那么在保留自身特色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为社会改革服务。

三、从崇拜到理性:陈独秀对教育的取舍

陈独秀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经历了从崇拜西方制度体系到辩证分析国内局势的理性思考,并接触和借鉴了杜威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这一观念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可以看出他为了实现理想目标,能够果断地抛弃“旧”事物,广泛接受“新”事物的立场态度。陈独秀教育思想中蕴含着功能性、现实性的意味,既是他对东西方教育模式的取舍,也是基于对现实问题的思量。

(一)取民主共和之基础,舍封建礼教之禁锢

陈独秀最早以唤醒青年之独立人格为开端,呼吁要向西方学习自主、进步、科学的精神,让青年意识到自身需求和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于是他批判孔教,主张摒弃千百年来的三纲五常、尊卑贵贱之理,指出树立平等人权之新信仰,要有抛弃旧思想的觉悟与决心。这也正是陈独秀推崇共和的前提,他认为民主共和在国家组织、社会制度、伦理观念等方面与封建礼教的思想无法调和。他既批判了当时政府挂着共和的招牌行封建之事,又痛斥根深蒂固的旧思想阻碍了中国现代化发展。陈独秀凭借西方近代文化“填补中国文化在抛弃孔子之道后的真空地带”^[30]。可见西方文化若在他容许接纳的范围内,便足以填补本民族文化的漏洞。但他并未涉及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世界文化之间理应在适当的引导下相互包容、相互影响。

(二)取实用主义之方法,舍形式主义之流弊

对学生的启发性、教育学科的实用性是陈独秀持续关注的问题。他指出自古以来的教育模式使教学有了“教化”的意味,导致学生失去了创造和独立思考的能力,面对枯燥乏味的课本,只能死记硬背,殊不知原理为何。而西方更善于挖掘孩童的自主性和好奇心,相较于形式上的传授,不如训练更为直

接、有效。他认为知识的教育和行为的教育同样重要,只有将教育趋重于社会,讲究实际应用,理论联系实际,真正做到把理论知识投入社会,才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因此,从教育方针的制定,到教学方法的调整,无一不以启发式为核心,讲求教育的实用性,旨在改革流于形式主义的教学制度与内容,将实用主义教育的思想和方法贯穿始终。

(三)取社会主义之思想,舍贵族教育之狭隘

教育的平民化、大众化是大势所趋,也是解放人民的重要手段。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推动教育事业的变革。与封建社会贵族的教育模式不同,这是面向工人阶级、面向社会大众的大讲堂。陈独秀开始将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阶级,他认为工人的教育十分必要,是现阶段提升工业质量的保障,也是实现教育平等的初步尝试。他不但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呼吁工人团体维护自身权益,倡导工人接受教育,提高文化素质。另外,陈独秀与同僚共同创办工人刊物,向工人阶级宣传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唤醒工人的阶级自觉。通过对工人的思想教育和社会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宣传工作总结了一定的经验教训。

总之,陈独秀教育理念的变迁与五四时期的社会现状息息相关。陈独秀认为,思想学说是在社会中产生的,改革教育的重点在社会而非个人^{[17]373}。1919至1920年间,正是他思想表现极为复杂的时期,他既倡导实用主义教育方法,又吸收借鉴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他对教育改革的急切,呈现出“拿来主义”倾向,虽然他毫不吝啬地吸收进步思想理论,但是也体现出他对这些理论的认识并不深刻。针对当时处于转型期的社会现实,若想将教育界的弊病连根拔起,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陈独秀也意识到了加快改革步伐的必要性,他认为人类因自身“惰性”的缘故,目标理想和实践行动在社会实际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难以同时进行,如果主张未超出现实、方针未超前设立,那么实际改革的成效就会大打折扣^{[7]203-204}。若站在这一角度,便也可以理解陈独秀思想的偏激。

四、结 语

《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曾评价:“和列宁一样,中国思想先驱们狂热地相信,历史的‘客观力量’会向一个确定的方向发展。也和列宁相似,因为这种客观力量不能在中国实现,而感到愤怒。”^[31]陈独秀欲借西方教育模式改变社会现状,实则脱离了国内实

际的教育教学水平,在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和取舍上也有失公允。但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影响,陈独秀不得不以偏激的手段进行改革,他的教育理念既是特殊时代下的产物,“也是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阶级分析方法的”^[32]。他将教育划分真伪,着重批判封建陈朽的思想道德,为民主共和思想的切实开展奠定思想基础;又将教育区分新旧,强调科学的方法与精神,注重教育对社会改造的功效。前者注重个人思想的解放和启发性教学的方法,规定了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教育方式、方法,设立了向西方模式学习的教育方针;后者更注重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工人的教育及其自觉程度,强调教育发挥对社会的效力。在完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的基础上,提倡落实教育普及,维护国民受教育的权利。二十世纪的改革相较于今日的现代化来讲是被动的,是拿来与借鉴西方先进、科学的教育理论与模式;而当今时代的发展则是主动、全方位的,是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向世界传播、提供范例。因受限于史籍文献的查阅程度、理论基础和研究条件等因素,缺乏更加细化、具体的分析。今后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结合新时代下的教育改革现状,深化对陈独秀创办工人刊物、推进教育改革实践等相关问题的探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002).
- [2] 陈松.陈独秀“新教育”观念初探[J].教育探索,2016(5):1-5.
- [3] 徐国利,刘卫.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教育思想的演变[J].安徽史学,2002(1):57-61.
- [4] 刘第红,廖宇红.陈独秀在广东的教育改革及其启示[J].高教探索,2021(7):116-121.
- [5] 陈祥明.陈独秀与蔡元培教育思想之比较[J].学术界,2014(1):140-157.
- [6] 陈独秀.宪法与孔教[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148.
- [7] 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 [8] 陈独秀.近代西洋教育[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9] 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10]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11] 薛玉琴,刘正伟.陈独秀道德教育观与进化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1):130-137.
- [12] 陈独秀.敬告青年[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13] 陈独秀.新青年[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14] 陈独秀.抵抗力[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91.
- [15]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79.
- [16] 高益民,符定梦.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外国教育的介绍与传播[J].比较教育研究,2022,44(2):16-24.
- [17] 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 [M]//陈独秀.独秀文存:三.外文出版社影印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 [18] 陈独秀.教育缺点[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19] 陈独秀.新教育的精神[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90.
- [20] 刘幸,施克灿.在激进与保守之间:论杜威在华的角色转换[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2,43(2):131-138.
- [21] 吕达,刘立德,邹海燕.杜威教育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
- [22]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45.
- [23]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 [24]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30.
- [25] 陈独秀.马尔赛斯人口论与中国人口问题[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502.
- [26] 陈独秀.告北京劳动界[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451.
- [27] 陈独秀.平民教育[M]//陈独秀.独秀文存:三.外文出版社影印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 [28] 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M]//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520.
- [29] 陈独秀.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M]//陈独秀.独秀文存:二.外文出版社影印本.北京:外文出版社,2013.
- [30] 马勇.“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的远见与盲区[J].河北学刊,2019,39(2):21-26.
- [31] 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上卷[M].杨品泉,张岩,孙开远,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402-403.
- [32] 张允熠.“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观[J].学术界,2019(5):5-16.